



外国文学研究
丛书

政治变革与 小说形式的演进

卡尔维诺、昆德拉和
三位拉丁美洲作家

裴亚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研究
丛书

政治变革与 小说形式的演进

卡尔维诺、昆德拉和
三位拉丁美洲作家

裴亚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变革与小说形成的演进 / 裴亚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5004-6845-5

I. 政… II. 裴… III. 小说史—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IV. 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5415 号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251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今年九月，我应邀到陕西师大讲学。受院长委托，裴亚莉主持了我的讲座。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之后我们共进午餐，星期日她又主动陪我们游览大唐芙蓉园，于是我们有了更多的交谈。我们谈时事，谈生活，谈文物古迹，谈学术研究……最后谈到了她的新作《政治变革与小说形式的演进》。她为人爽快，温文尔雅中带有一丝豪气。她说想请我为她的新作写序，我不敢贸然答应，只是说先看看作品吧。后来她通过电子邮件把作品发给了我，并再次表示希望我能作序。我浏览了一下目录和绪论，觉得可能是一本不错的书，于是我告诉她，“如果需要，我可以写序”。

后来我读了她的新作。确实，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单是书名《政治变革与小说形式的演进》便使人感觉到一种新的视角和立场。近些年来，人们关注小说的美学，小说的艺术技巧，小说的叙事结构，但很少把小说和政治相联系。其实，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处不在。人们生活在社会里，本身就是社会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构成物，怎么可能脱离政治或意识形态呢？所谓去政治化或摆脱意识形态，说到底就是在坚持另外的某种政治或意识形态。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即使他们宣称的是非政治的小说观念，这一种观念也是以政治为其主要参照的。”因为“每一

2 政治变革与小说形式的演进

种观念都是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对某种政治观念的反应”。所谓小说应当远离政治，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观念，他们要远离的是他们不感兴趣的、政治。希望文学远离政治，这既是一种文学态度，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政治的理解，裴亚莉讨论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小说的观念演变和形式演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实际上，一切文学文本都是历史和记忆的再现。记忆既是生理活动也是心理活动。记忆有个人记忆也有集体记忆。记忆的表达要通过语言。因此当人们述说记忆时，就变成一种再现的活动。再现要通过记忆，主要是人的记忆，但现在也包括机器的记忆。不论人的记忆还是机器的记忆，都要通过某种语言。以语言的再现构成文本，当然也包括小说作品。

关键是再现活动。再现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受某种意识形态的支配。在人类的记忆中，容易记住的是非常重大、非常好或非常坏的事情，是非常愉悦和非常悲伤的事情，而一般的事情常常被忘记——忘记也是人的本能。因此记忆本身具有选择性。对历史事件乃至个人经历的记忆，同样具有选择性。在再现记忆时，这种选择便构成主观性的叙事。这种叙事不可能绝对客观，它由多种因素决定，包括叙事的语境，叙事者的政治立场、知识结构、阶级身份、意识形态，等等。海登·怀特等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具有明显的虚构性。怀特的看法具有启示意义，但他也有些极端。因为按照他的观点推论，便会否认历史的本体存在。我们可以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解释，但事物的本体存在却是客观的。再现历史和个人经历的叙事，需要以唯物、辩证的态度来对待。

文学文本是虚构的叙事，同样也是再现，只是它再现的是作者的意识、思想、认识和感情。因此文学作品的主体意识和主观

性更强。当我们分析这种主体意识和主观性时，不应忘记作者是社会中的人。就是说，虽然文学作品是个体的产品，由作者自己创作，但它同样是社会的产物。因此阅读文学作品时，既要从微观入手，同时也应有社会观照和社会总体意识，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一种政治视角，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文学对社会的干预作用。

对记忆和历史的再现是人的一种文化活动，它首先取决于再现者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而读者对再现的文本的解释，同样也是如此。

裴亚莉以政治切入为基础，从政治、科学、阅读（经典的重写）、梦和时间、种族等几个方面对五位作家的作品进行了解读。我们知道，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概念化的过程，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概念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裴亚莉首先对政治、科学、阅读、种族等概念进行界定，追溯其历史发展，然后逐一展开，运用于她对作品的论述。尽管她说“这也许不是一个完全的解读途径”，但我想这种解读方式不仅行之有效，而且是很特点的。

在“政治和文学形式关系”的统领之下，裴亚莉融合了20世纪的多种理论，对五位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系统的阐述，既有中心论点，又有点面结合，历时和共时交错，形成一个整体，读来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拓展了对后现代小说的认识。如她自己所说：将这五位作家统一在一起的因素是政治的因素，同时也是小说观念的因素，因为这五位作家的生平都深受政治的影响，而他们在创作上又无一例外地有着改造、革新小说形式的抱负。由于人们对后现代小说的理解往往带着非政治的偏见，故而，从政治变革对小说形式的变革产生影响这个角度出发对这些作家进行研究，是合理的，也是有价值的。

4 政治变革与小说形式的演进

其实，裴亚莉从政治角度出发解读这些小说，表现了她对文学的认识。在她看来，知识分子天然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都使社会政治问题从未离开过小说家和他的作品。作家要改变的不仅仅是现实的政治生活，而且，他们想要参与的，更是一种政治意识的建设。反过来看，政治也是促进文学形式变革的重要因素。裴亚莉对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政治和小说形式的关系的论述，体现了一种富于时代色彩的意识。

据裴亚莉讲，她开始思考政治和小说的关系始于十多年前。十余年来，虽然她只是断断续续地写作，但却一直不间断地思考和探索这一问题。如今她终于把写就的东西归结在一起出版，在某种意义上，真可谓是“十年磨一剑”了。尽管她论述的作家来自不同国家，但政治和小说的关系这一主题又把他们统合为一体。因此，不论从治学态度还是研究方法，裴亚莉的做法都是值得借鉴的——对年青一代恐怕更是如此。

裴亚莉还很年轻，只要不断努力，相信会取得更多的成果。我期待着她有更好的作品问世。

王逢振

2007 年初冬

序 二

裴亚莉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就喜欢意大利当代作家卡尔维诺。记得有一次我与她一起出去办什么事情，回校的路上，她突然对我说：童老师，让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我说，那你就讲吧。她不假思索就讲开了……

我现在把她给我讲的故事忘记了，但那时的印象还很清晰，似乎是一篇像寓言一样的故事。她讲完故事后，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写的故事吗？我摇了摇头。她说：这是卡尔维诺一篇小说中的故事。

裴亚莉给我讲卡尔维诺的故事是有目的的，她想研究卡尔维诺的小说，并以此作为她的博士论文题目。经过开题报告，她终于起步开始了卡尔维诺研究。但中间遇到困难，不得不放弃这个她感兴趣的课题。后来她以一篇讨论当代电影问题的论文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现在看来，她还是没有忘怀卡尔维诺，还在持久地关注卡尔维诺。经过长期的研究后，她撰写出了这部书。虽然她的这部书所涉及的作家还有昆德拉、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但论及卡尔维诺的篇幅占了一半。可见用力最勤的部分还是卡尔维诺。这里我也就围绕着她卡尔维诺研究谈点我读过她的著作后的感想。

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研究者，总是能够用他的情性去对待

6 政治变革与小说形式的演进

他的研究对象。所谓“心与理会”、“辞共心密”（刘勰），讲的就是能够把研究的对象移到自己的性情中来，而不是当作外在之物。裴亚莉笔下的卡尔维诺，正是经过她的心体会过、理解过、琢磨过的，因此，这个卡尔维诺是裴亚莉眼中、心中的卡尔维诺。

对于政治与形式的关系的论述，是裴亚莉此书的核心之点。此书着力凸显卡尔维诺是怎样将不同的政治变革的环节折射到小说的形式创造中来。卡尔维诺曾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的文学活动是离不开政治的，但他又认为文学有自己的独立性，不能与政治混为一谈。特别是生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和之后的作家，无论他是谁，都不可能摆脱政治这个问题的“纠缠”。他或者是将自己的文学活动从属于政治，最终成为政治的传声筒；或者是为艺术而艺术，摆脱政治的制约，走入象牙塔，可这也是一种政治。但是卡尔维诺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以及他的创作实践，却走出了一种要政治也要文学的新路子。裴亚莉以她的令人信服的分析，证明了“卡尔维诺可以将政治和文学明晰地区分开来。他关心政治，也关心文学，但最终认识到不能将政治和文学混为一谈；他认识到文学和政治不能混为一谈，又深刻地认识到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从未完结。他一生都不刻意地排除政治和文学的关系，也不放弃为文学本体寻找独立性的道路，这就树立了永远独行的形象，就能够在自己所认定的道路上继续取得进步；不像有些作家，先是狂信文学之能够改变社会的号召，后来发现误入歧途，要想再改变创作的风格，已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在政治和文学的关系这一点上，卡尔维诺是矛盾的。我们珍视于他的，恰恰是这样的矛盾。这个矛盾决定着作为一个作家对丰富性和整体性的把握，而不是沦为某个单一的极端”。我觉得裴亚莉的确理解卡尔维诺，深刻地揭示了卡尔维诺关于政

治与文学的独特的思想与实践。

裴亚莉说：“卡尔维诺认为，当文学给尚无声音的东西以声音，给尚无名字的东西以名字时，文学对政治的功用，要大于任何东西”，她引用了卡尔维诺的话：“文学就像一只耳朵，它可以听到政治语言所允许听到的语言之外的意义；它就像一双眼睛，可以看到政治所允许看到的光谱之外的颜色。因为作家的工作十分个人化，所以作家有可能发现别人尚未到过的地方，这个地方也许存在于他的内心，也许存在于他的外部世界，但最终可以达到开拓集体意识的作用。”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多么发人深省！有志于写作的人，真的应该好好听一听、想一想。

裴亚莉书中另一个重点就是介绍并评述了卡尔维诺关于文学与科学的关系。这不但是卡尔维诺的话题，也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

在欧洲，科学不断介入文学。裴亚莉把这个过程正确地分为三个阶段：文学与科学关系的第一个阶段是科幻小说的兴起。第二个阶段是，科学的方法成为写小说的一种方法，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定律被使用在了小说的形式建构中；同时，科学事件也成为了一种小说题材的源泉。第三个阶段是，文艺理论的“语言学转型”上，借助了语言学成果的文艺理论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再到法国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贯穿着的精神都是理性和科学的精神。作为后现代小说家，卡尔维诺以不倦的形式创新闻名，这正是科学和理性的精神在小说探索上的反映。裴亚莉下了很大的力气，饶有趣味地具体分析了《树上的男爵》、《看不见的城市》等作品是如何折射了科学精神和科学的文学观的，特别是其中所论述的卡尔维诺的“几何理性和晶体结构”，给人以新鲜的感受和思想的启迪，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欧洲作家如何既受他们的历史文化的影响，又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追求。裴亚莉在书

8 政治变革与小说形式的演进

中所介绍所揭示的与科学相关的“确切”的概念，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介绍说，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仅有的五节篇幅中，用了整整一节来讨论“确切”这一美学价值观念。卡尔维诺在定义自己所说的“确切”的含义时，指出这个概念首先包含三层意思：（1）作品的构思非常明确；（2）视觉形象清晰，令人难忘；（3）语言尽可能精确，词汇要准确，要充分表达各种思想的细微差别。裴亚莉力图证明卡尔维诺的思想深受笛卡尔的影响，又如何把这种“几何理性”转化而来的“确切”，作为小说艺术的审美规范。科学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在欧洲是一个传统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始终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是令人遗憾的。其实，科学与艺术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它们之间存在一个互动的关系，科学为艺术提供思想、规范，而艺术也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但在中国一直被漠视，现在裴亚莉通过卡尔维诺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有现实感、很有价值的问题。

裴亚莉论述卡尔维诺文学思想的另一个重点，是论述卡尔维诺的创作与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的关系。这的确抓住了卡尔维诺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无论中外作家总会把自己的目光投向民间故事和神话，以求得创作的突破，这并不是新鲜的事情。问题在于卡尔维诺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对于民间故事和神话的吸收有自身的方式与特点，这对于我们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按照裴亚莉给我们提供的论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作家中，没有一位作家，能像卡尔维诺这样如此深刻又紧密地将自己的极为先锋的创作，与古老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从卡尔维诺的后期创作来看，民间故事的思维方式也影响了卡尔维诺的创作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宇宙观。写先锋，却与

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相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特的方式。另外就是以“置换”的方式去利用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

裴亚莉举例说：“卡尔维诺发表于1952年的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其基本形象是这样的：一个子爵，在战场上被炮弹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善的，一半是恶的；最后的机会到来的时候他们又合二为一。而《意大利童话》的第33篇是一篇名为《苹果肉和苹果皮》的故事：术士给多年不育的王后一个苹果，这是她可以生育的种子。王后让女仆削苹果，女仆吃了苹果皮。结果王后和女仆在同一天怀孕，在同一天生下两个男孩，一个叫作苹果肉，一个叫作苹果皮。”这种“置换”方式的确很具有创造性，与一般作家只是改编、重写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是很不同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卡尔维诺更重视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的内在肌理，而不在重复上下工夫。

裴亚莉还告诉我们，卡尔维诺特别注意到了民间故事对数字“3”的特殊运用。卡尔维诺对这个“3”进行了独特的改造。裴亚莉说：“如果我们真的将这几篇作品的结构进行分段，那么它们无疑都恰恰是三段式的：情景、机缘和结果。但它与民间故事中的三段式的不同在于，这里的数字“3”不是指三次历险，三个兄弟。卡尔维诺吸收了“3”的精神，以此获得最明晰的故事结构和简单的讲述故事的旋律——将多变的细节留在每一个段落的更为个人化也更为自由宽阔的空间当中。对个体经验的描写更能体会叙事自由的精神。可贵的是这个自由是在一定的规范中（三段式的规律）进行的。”这就是说，卡尔维诺的确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吸收。这在一般作家那里的确是较少能够达到的。裴亚莉的书中还涉及其他一些内容，读者可以自己阅读，我就不再啰嗦了。

我认为裴亚莉的书不但有学术价值，而且又有现实意义，对

10 政治变革与小说形式的演进

于如何吸收我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的养分都是有助益的。裴亚莉的书的另一个优点就是能把对于作品的细读与理论的阐述结合起来。在学术研究中，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消化、理解，达到举一反三的地步，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最重要的是，裴亚莉对于卡尔维诺的完整性、丰富性的深入揭示，使她的书进入一个较高的学术层次。这说明她确是用了心的，她的言说应该说都是从其本人的情性中自然流露出来的。

裴亚莉是热爱文学的，而且是有才华的。我希望她在学术研究的事业中能够“修成正果”。

童庆炳

2007年11月

目 录

序一	王逢振 (1)
序二	童庆炳 (5)
绪论	(1)
第一章 卡尔维诺 (Italo Calvino)	(11)
第一节 面对社会政治和群体之裹挟的卡尔维诺 小说	(12)
第二节 卡尔维诺的科学文学观	(50)
第三节 形式试验:对卡尔维诺科学文学观的补充	(76)
第四节 卡尔维诺的创作与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	(98)
第二章 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	(136)
第一节 小说的四个召唤	(137)
第二节 昆德拉作品中的解释主题和复调形式的 选择	(156)
第三节 性、游戏和诗意	(179)
第四节 虚构、现代小说的精神和金圣叹的小说 观念	(196)

2 政治变革与小说形式的演进

第三章 拉丁美洲作家和文本的性别政治研究	(230)
第一节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230)
第二节 科塔萨尔(Julio Cort'azar)	(242)
第三节 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	(252)
第四节 种族、性别和文本的政治	(270)
结论	(288)
部分参考文献	(290)
后记	(298)

绪 论

一 解读后现代小说的几种方法

也许并没有哪几种方法可以归纳后现代小说的解读方法。

在有关后现代和后现代小说的理论中，除去思想、观念，有哪些是可以称为方法的？

事实上，我们发现，方法还是以往所有的方法的总和，但要说明的思想和观念，却是当代的。这大概就是后现代小说的阅读和批评的任务。

所以我们也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后现代小说进行解读：政治、科学、阅读（经典的重写）、梦与时间、种族与性别。这也许不是一个完全的解读途径，但却有效的解读途径。

由于后现代的小说作家普遍保持着对理论的敏感，并且总是乐于将理论探讨置于小说创作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些往往被称为“元小说”的小说，同时也清晰地表露出了它们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因此，从以上的几种角度解读后现代小说，事实上是在辨析后现代小说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型、与读者反应批评、与弗洛伊德以来的精神分析，以及与种族和性别理论之间的关系。

2 政治变革与小说形式的演进

1. 政治

从方法论上讲，首先要对“盲人摸象”的故事进行重新理解。盲人需要调查研究才可以知道“象”为何物，这是现实主义的认识论，认为盲人应该知道“象”为何物，认为盲人如果进行了足够的调查研究，就能够知道“象”为何物。但事实上，盲人是不能像视力正常的人一样知道外部事物的形貌特征的。因为他们没有视力，这是不可以更改的事实。而即使像我们这样视力相对健康的人，能够知道大象的外部形貌特征，并不意味着就知道大象是什么；就好比人在认识外部世界的时候，不可能没有认识的盲区。人总是不能完全地认识世界，人甚至不能完全地认识自身。认识是一个接近真理的过程（假如有真理的话），而不是把握或者拥有真理的过程。事实上后现代哲学在本质上是否认真理的存在。这就是人的认识从“非此即彼”到“或此或彼”的转变。

从认识对象上讲，现实主义文学的认识对象是外部世界。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往往抱着要通过写作和作品改变现实世界的目的。在革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里，这样的目的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革命导师常常将这些作家作品称为“镜子”，比如巴尔扎克的作品被称为“法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托尔斯泰的作品被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而莎士比亚的作品，则被认为生动地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性。但是，后现代小说的目的却不一样。后现代小说要颠覆的对象是一种旧的小说理念。这个理念不是现实社会。这个颠覆是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在观念的意义上，是在语言和符号层面上的颠覆，是非暴力的，是理性的；而现实主义小说和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则是暴力的变革方法所特有的对社会现实的指导作用。